

聂荣臻同志

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论述

(此材料供院内研究游击战使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翻印

一九八〇年六月

目 录

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之一（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军事问题报告提纲第四部分（一九四〇年七月十七日）

武装斗争中的军事建设问题（一九四一年十一月）

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

聂荣臻

一、在战斗中生长的晋察冀边区

我们今天在敌人的远后方建立起来的，包括三省七十二县，十万多公里，一千二百余万人口的晋察冀边区，成为敌人的心腹大患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这并不是如外间人可能会想象到的那样神密的事情，但同时却也不是一条很简单的事情。

边区的建立，到现在已经整整一年了。这一年历史，是一段残酷的斗争的历史。边区一年来始终是处在艰苦斗争环境中，在无限困难条件下，开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华北广大人民抗日民族自卫战争的洪流中的产物。这一年的血肉的斗争，充满着痛苦和兴奋，辛酸与悲壮。自太行山五台山恒山绵亘不断的山岳地带，直延至冀中的广袤平原，而边冀察热宁边境，在正太同蒲平汉平绥以里津浦北宁几个铁路干线之间，到处交织着暴敌血腥的屠戮，和千百万不愿当亡国奴的黄帝子孙抗敌的杀气，燃烧着神圣的为和平正义生存自卫的烽火；到处洋溢着敌人疯狂的炮声和民族抗战的怒吼。今日的晋察冀边区，在华北广阔的领土上，无疑的已经形成了相当坚固的堡垒。

我们回顾一下，这个堡垒从它的初创到它的形成，自己也不自觉得居然是经过了这样的一个艰难缔造的过程。

这个地区，当去年（一九三七）十月间太原失守以后，不但和国

家的总后方隔离了，无所凭借，而且就在这一地区的范围内，由于太原的失守后，也陷于极端紊乱的状态。那时各县的政权机关，实际上已经全瓦解，在主要的晋东北区域，除了五台盂县而个县政府，在现任边区行政委员会宋主任劭文和胡副主任仁奎领导之下，仍能执行政务外，其他各县政府工作人员，都已逃散一空，偌大区域中，简直找不出原有地方行政负责人。社会秩序紊乱，散兵流匪乘机活跃，汉奸随时随地欺骗造谣，影响到人民情绪的动摇，因不安而逃跑，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几乎没有任何的信心，悲观绝望失败主义的情绪，已经充分的表现出来了。我们走过了市镇，市镇是萧条的；走进了县城，县城是空虚的；城镇上留下的，多是年老的汉子和婆婆，许多县城都象是快要死灭了一般，兵燹之后的荒凉景象，支配了这整个的地区，一切是无秩序，破坏和崩溃，这样就增加了我们许多的困难。

那时正值严冬的季候，五台山上积压着层层的白雪，雪花家鹅毛一般，在这山地区域里昼夜纷飞着，寒冷的气候，就是过惯了北方山地生活的居民，也都感到难堪。但是，那时我们的部队，大多数指战员还没有棉衣，赤裸的套着一双草鞋，寒威刺骨的风雪，打着每一个人的肌腹，幸而大众的内心，都积蓄着一股杀政的勇气，鼓午着数国的热情，还不曾变成沙场冻死的枯骨。然而部队的给养，毕竟使得当时供给部队的同志经常感到苦恼。因为没有一定的供给来源，顾得今天，顾不得明天。而且又加以少数商人乘机居奇，我们在经济困难的时期，反而又受了更多的损失和耗费。

在运输和物资动员的方面，那时似乎真的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许多退军把车骡粮秣往南拖去，我们的部队要往北开的，就受了极大的影响。当时山西第一区政治主任公署所发的文件中，就曾沉痛的说过：

“一批一批的退军，拉得一批一批的驮骡毛驴，载的东西是西粉，锅灶，破旧衣服，此外还有人。然西手榴弹、枪、子弹、炮，都是沿路扔。因此上边定下长差与短差的办法，可是实际上短差也大部都是长差，出去的多，回来的少。请求上达办理，公事上说：‘已令饬该部队放还矣’，然西有多大的效果？车骡是当下养不出的，前线上死了多少，丢了多少，退军拉了多少，那里有取不尽的车骡被征调呢？有一天，许多撤退的部队，向五台县要的驮骡总数达六七千头，这就是有天大的本领，也是没有办法的。”（见宋劭文氏动员骡车粮秣的经验教训）。

在其他军队撤调紊乱的状态中，我们的供给和动员问题，当然不能不感受万分的困难。眼睁睁地看看山巅的白雪，地上的炭（？）冰，纵然使我们的手足冻裂，全身在风雪中颤栗，然而战斗的任务，激励着我们，要忍着饥饿，鼓起勇气，挺起着胸膛，握着枪杆，和那残暴的敌人作战。

那时，由于战局的紧张，敌人正在到处建立伪政权，组织汉奸队伍，不断企图消灭我们的游击队，稳固他的后方。我们为了保持国宋的领土与主权，摧毁伪政权及汉奸武装，开展敌后方的游击战争配合

主力部队作战，不得不以我们所仅有的少数基干队伍，配合着地方上新发动的一些群众武装，积极袭扰敌人。但是每次战斗总免不了有伤亡，而这些受伤的战士，当时既没有后方医院，又没有充分的医药，连棉花绷带都感到缺乏。许多伤员，往往几个星期敷不到必需的药剂，就是勉强能敷上一点，许久也不能换药，加以食物不足而且恶劣，吃的尽是些干涩而缺少滋养料的小米，山药。躺在民房土屋中，天气寒冷，身上衣薄，且血迹斑污，一时找不着替换的。被褥又难得得到补充。他们为了国家民族，虽然辗转呻吟于床榻，却能含辛茹苦，没有丝毫怨叹。伤势稍轻的，每日还不肯放弃政治学习，仍然张着枯黄的脸，撑着如柴的驱骨，不懈地讨论着战争的形势。这些中华民族优秀的热血男儿，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拚着血肉，忍受着创痛，只觉得是应该的，大家都忘记了流泪，而且也不得不忘记流泪。我们也曾竭力设法，希望从其他地区和后方，多少找一点医药物品和补充，然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直到后来，我们得到美国医疗队的白求恩大夫(Dr. Dr. man Buhine)来军区热心的帮助我们，担任军医的医药顾问，建立了模范病室，才逐渐能解决了部队医疗卫生工作上的各种困难，然而起初很长的时期，我们是得不到任何帮助的。在最艰苦的环境中，只有节衣缩食，忍痛挨冻，艰苦奋斗，是我们克服困难的唯一法门。经验告诉我们：困难的时期，只有自己设法战胜困难，渡过难关，舍此以外，一切消极悲观，就只有灭亡。

其次，在这游击区开辟的当初，我们遇到的另一个困难问题，就

是兵力过于单薄，敌强我弱，而新的队伍又缺乏经验，急切难于制敌。

当时这一地区留下的部队，实际上是非常的少。当八路军主力南下赶赴娘子关与晋南战场时，此地只剩了一个特务团，一个骑兵营和两个不完整的连。兵力单薄，而又缺乏友军的配合。然两紧迫的战争环境，却课给这些部队以重大的战斗任务。那时我们仅仅以两个游击队，东西驰骋于阜平，曲阳，完县，唐县，涞源，广灵，灵邱，蔚县，满城，易县，平山等地。所到之处，毁敌交通，推翻伪组织“维持会”，建立抗日地方政权机关，发动群众组织与地方武装。抛弃了一般的强迫召募的方式，依靠着广泛的政治动员，创造了新的抗日部队。从战场上取得残缺不全的武器，凑合了民间捐输的破旧枪支，武装起来，与敌人进行了大小二十余次的战斗，使敌人积极的沿主要铁路交通线向河北，山西腹地进攻的计划，遭到意外的严重打击。靠着地方群众热烈的拥护与协助，我们的游击队，胜利的用单独的猛攻急袭的行动，深入敌后，纵横穿插敌军之前后左右，杀伤其人马，缴获其辎重，牵制敌人以利正规军作战，虽然起了不小的作用，得到了许多出人预料的可惊的成绩，但当时力量，毕竟还很薄弱。许多地方，为了要和敌人作战，要予敌人更大的打击，需要有更多的武装力量。然而，这些力量从那里来呢？除了积极发动民众之外，显然没有第二条路。但是民众武装，也不是急切能够训练成为坚强不拔的战斗队伍，在敌人四面包围不断威胁中，到处是散兵土匪，素来没有军队的教育与训练的边区民众，多数四散逃亡，本来不敢相信自己还有

抵抗敌人侵略的力量，加以汉奸乘机造谣，诱惑群众，不要参加武装，安心做敌顺民，以动摇落后分子，更多多少增加了我们工作的困难。固然，由于日寇残暴的抢掠，奸淫与屠杀的惨酷行为，使民众从愤恨中掀起了反抗的烈火，和我们游击队神勇的战斗的模范行为，引起了群众的信仰，与军敌干部耐心深入的宣传鼓动的努力，迅速的发动了觉悟的群众，积极参加了游击队和义勇军里来，然而那些在仓促中组织起来的新的游击队义勇军，毫无作战经验，而时机紧迫，事实上又来不及从容训练，只好迅速集中了已经编成的队伍，即时开上前线，依靠着旧的部队与个别干部及战士的领导教育和影响，和高度发扬群众的抗日情绪，坚决和敌人苦战，撑持着初步建立的游击区域，而在撑持中，逐渐求得发展。可是那时许多新成立的武装队伍，首先感到的就是普遍没有武器，从战场上打扫到敌人和退军所遗下的枪炮子弹和缴获的武器，多是残破不全的：有的没扳机，有的没刺刀。自己设法修理，勉强使用；破坏了铁路，把铁轨改制刺刀，直到今天，这仍然是我们解决武器问题的办法。所谓“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的游击队歌，在这里真正得到了事实的证明。同时也收买并搜集了些民间捐输的枪支，及义勇军自己带来的枪支，帮助解决了武器的问题。但是，除了武器之外还有干部问题，起初更表现得严重。干部的缺乏会使每个人皱眉，四面八方喊出的声音，都是“要干部”！“要”不出来也硬得“要”，不让他们要也实在不行，结果就是我们原有的稍为“老”的警卫员，勤务员以里马夫、伙夫，也都不得不让他们“要”

了去当队长或指导员。为了要应付紧急的战局，为了要回答群众的要求，为了要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和当前兇恶的敌人搏斗，他们既有上前线血战的高度热情，我们又怎能因为恐怕他们经验与能力的不够而“吝啬”地不让他们去呢？！虽然许多人盼望着：后方能给我们送一批下级干部，来弥补这个缺憾，无奈后方被敌人切断，一时难以打通，就是后方有干部，当下也不能插翅飞来。遥企着辽远的后方，何处有“神兵天将”？况且，在全国抗战急速开展的过程中，所谓后方，到处也都普遍感到干部的缺乏。自己要训练一批干部，又不是立刻可以造就的，因此除了在战斗中锻炼，大胆的提拔之外，显然已没有较好的解决干部恐慌的办法了。后来我们自己开办了“军政学校”，一般的逐渐解决了部队下级干部的恐慌。但是在初期，干部的严重困难，却是无法避免的。当时在敌人四面围攻之下，以不熟练的干部，率领着新武装队伍，和强大并且各有新技术的敌人作战。对于没有坚决信心的人，固然是绝无此勇气的；然而，我们幸而有此勇气，而在开辟游击区的初期的战斗中所遭受到的困难和苦恼，也就不是在回忆中所能想象的了。

此外在游击区开始创立的时候，由于地方武装的复杂性所引起的不统一的状态，又曾给予我们以重大的困难。

沿着太行山，五台山，恒山的山麓，在敌人继续深入华北，太原失守的前后，无数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相继地在“保卫家乡”“保卫祖宗坟墓田园”的口号下，纷纷自动武装起来，千百成群，聚成队

伍。他们以各种名义组织起来，和敌人作战。同时，有许多原来在华北抗战部队，因与主力失却联络，留在华北，或根本不愿撤退，决心要在敌人后方继续作战；他们也都自动的形成一种武装组织单位，吸收当地民众参加，各自活动在敌人侧后。这种武装力量，为数亦颇不少。此外还有一些积极抗日的军官，得到政府或地方上的军事机关的承认，在华北建立游击队，他们派人就地收纳流亡散兵，也组织了若干游击队性质的部队，这些部队和各种自发的人民抗日军，都是在这一地区活动的武装力量。

但是，也正因为地方抗日武装风起云涌，各部分的地方工作和作战方针也就很不一致。虽然大家的目标都是“抗日”，可是各人的“抗”法不同。各武装部队对于民众的关系以及部队与部队间的互相关系，都很不密切。最可恨的是汉奸从中挑拨离间，少数兵痞流氓乘机活跃，地方上的不安宁现象普遍的存在，抢掠、胁迫、勒索，时常发生。少数队伍纪律不良，给了民众恶劣的影响，我们收到这类告发的信件，日必数起。老百姓有的痛哭流涕要求“剪除地方之害”，但我们觉得这些少数不良分子，假借抗日名义，实行变相的土匪政策，乃是初期紊乱状态中所难免的。我们相信：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难中，稍有国家民族观念，稍有热血心肝的人，绝不愿忍心荼毒人民；即使就是纪律极坏的军队，也不是完全不能争取而转变过来的。因此，我们对于少数落后的队伍，仍然耐心的本着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不断进行说服解释工作，极力消除各部队彼此的误会与隔膜。有时个别友

军中不明局势的士兵或工作人员，偶然在外为非生事，我们为了维持地方安宁，总是平心静气，以理劝阻；有时遭到无理反抗，不得不加以扣留，但是经过一番说服教育之后，仍一律用公文送还原部队，一面对民众作详细的解释，以促进各方面的关系，使这些不良现象逐渐减少。虽然在各方面还没有深切了解，没有确定统一战线的办法与制度之前，此类困难与纠纷，总是无法免除。我们的工作同志，整天耗费在这些令人头痛的事件上的时间，竟达到可惊的比例。那时我们连队部和地方的动员委员会，就曾经一天处理了十二起扰乱治安的案件。

至于各个部队之间作战方针上的不统一，在同敌人进行战斗时，不能共同协作，配合作战，力量分散，甚至造成军事上的损失。这在初期更是无可申诉的苦楚。往往在一个战斗中，各个部队互不联络，谁找上敌人，谁自己去干，别人只能在旁观战。事实上只管各个的分区，各自为政，力量分散，无形中便宜了敌人。在这一游击区开辟的初期历史中，此类事实不一而足。

然而，这些在游击区开辟的初期历史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只能给我们的工作以某些限度的苦恼与阻碍，却不能根本停止我们创辟游击区以至于建立根据地的伟大事业的决心。在我们地方工作同志的积极努力之下，在我们部队的指战员英勇的搏斗之下，在广大人民的热烈帮助之下，我们毕竟创辟了晋察冀边区广大的游击区域。但是那时我们所占领的区域还不曾稳固。虽然我们早在十月十七日

(一九三七年)，就在五台县城准备成立晋察冀军区，各直属队宣布开始办公，十一月七日正式宣布军区成立并划分军分区的命令。各军分区及分区基本部队宣告成立，然而各分区的武装还不曾普遍的发展，新成立的部队本身还很不健全，质量也还很差，还只能组织零星的游击战，还没有把进攻这一地区的敌人尽数打败。我们克服和保持的地方，还很不巩固，汉奸伪组织的活动还不曾基本肃清，民众的抗日组织还没有普遍的建立，发动民众武装的工作也很不够，民众的积极性也未普遍发扬。尤其是那时在许多县分，原有政权机关被敌人摧残和瓦解后，还没有建立起抗日的政权。因此，我们的工作，在当时只有开辟了一个华北较大的游击区，还没有建立成功一个巩固的根据地。

但是，经过了一个短时间的各方面不断加紧的努力，这一游击区的条件，逐渐有了大的进步，这一进步，造成了晋察冀边区的新的局面，踏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边区中心区域的广大县分里，军事上，政治上都有了相当巩固的基础。它已经不再是一个游击区的形态，而是一个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了。

从游击区到根据地的这一转变过程，完全是和困难作斗争，而逐步克服那些困难的最艰苦的缔造的过程。一切客观条件的改变与进步，都是依靠着主观的努力。

当时我们认定了：为要早日的完成我们在敌人后方大规模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必须集中全部力量，把游击区扩大巩固起来，使他成为一个强大的抗日根据地，这样才能保存

自己和发展自己，把敌人从广大的华北领土上消灭或驱逐出去，以完成我们的战略任务。否则，我们既与国家的总后方隔绝，而自己又没有足以长期生存发展的依托，没有自己的游击后方根据地，那么，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我们的游击战争势将无法支持。我们既清楚的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提出而且坚决执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

为了执行这个方针，我们首先集中力量，进行发展武装和巩固部队的工作。我们用了全力，广泛的发动群众的武装，普遍组织游击队、义勇军，当时在晋东北各县，广泛的号召组织游击队或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在晋而各县，普遍组织义勇军。积极的提高并紧紧的抓住了群众抗日的情绪，使他们踊跃地加入军队，发动胜利的游击战争。打扫战场，收买民间枪支，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来武装自己。同时把少数的基本部队，放胆的分散出去，并派出尽可能有的干部，坚决的执行扩大武装的任务，不断提高政治教育，扩大政治的影响，加强部队的干部的领导。各级干部也都能埋头努力，艰苦耐劳，为完成任务而斗争。这样，我们在各分区就建立了相当大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与大量建立武装的同时，便集中火力，积极克服了各种严重的错误倾向，肃清了土匪主义，军阀主义的残余；纠正了地方上初期工作中个别干部的滥发委任状，利诱式的发动武装，脱离了统一战线的策略；从部队中坚决的洗刷了地痞流氓等坏的分子，加强并提高了部队的数量和质量；不断发扬了战斗中的模范作用；把部队逐渐巩固了起来。

总观这些武装部队的发展与巩固的全过程，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军区才成立的两个月间。那时正当边区初期作战紧张的时候。除了我们基本队伍之外，各分区的武装，方在萌长；有的基本队伍正在和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未及扩大；有的新发动武装力量还很少，并且散在乡村间尚未集中；有的还正在着手发动组织。为了应付前线的战事，匆匆把已经组织和编制好的即时开上前线。未组织好的加紧组织，陆续调往前方，进行零星的游击战。依靠着全体指战员高度的积极和勇敢，得到了许多的胜利，如：三分区的游击队在平汉线，二分区的游击队在同蒲作战，都得了不少的收获。在胜利中提高了群众对游击战的信心，因而参加抗战的武装动员工作就更易于进行，各分区的部队随着也有了迅速的增加。不过这一时期的中心，只是放在发展部队方面，对于部队的整理与训练还谈不上。

第二阶段，武装组织已经有了相当的成绩。各分区都成立了相当数量的队伍。这时的中心工作，就是加紧整理与扩充。开始淘汰坏的分子，经过一番整顿，各区各县逐渐集中起来，把赤手空拳的农民变成武器相当齐备的民族战士；把许多小的零星的游击队，自卫队，义勇军逐渐汇合而成营，成大队，成支队，于去年十二月十一日正式成立了一个基本的游击支队。在各部队中都建立了正确的政治制度与生活制度，加强部队的教育，同时仍继续着开展游击战争。以少数部队向四外活动，牵制敌人；大部分则集中整理，加紧训练。若干小队伍，此时已组成兵团性质。而在这一阶段终了的期间，有些大的队伍，并已向正规化的道路转变。通过这一阶段中，各部队的作战都更加活跃

起来。这一时期也约有两个月。

第三阶段是从今年（一九三八年）二月份开始的。这时工作的中心完全放在巩固方面。这时期因为部队经过一番大整理，继续不断的洗刷淘汰了许多坏的成分，部队的质量有了极大的改变与进步；战斗员在政治上日益坚定与巩固，战斗力量增强，所以能够全部出动攻击敌人。这些部队不但能够进行小规模的游击动作，而且能够有计划的组织大的战斗，到处表现出兵团形势的活动。大部分的部队都走向正规化了，同时在这些部队的周围，更繁殖着新的游击队。

经过了这三个阶段的工作，军区的武装力量乃得巩固地向前发展。这些武装力量，不可否认的，是八路军的产物。它能够继承八路军的光荣传统。他们都能采取八路军的制度与方法，仿效与学习八路军的精神。同时，在扩大与巩固部队的时期中，我们又和吕正操司令所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取得了大汇合。人民自卫军后来改编为八路军的第三纵队。在吕司令指导下，这个部队学习着八路军传统精神，学习了八路军的经验，迅速提高和发扬了战斗力，成为支持冀中军区的伟大中心力量。当时我们得到这些武装力量合聚在一起，更加强了杀敌制胜的信心。至于广泛的地方上不脱离生产的群众自卫队的建立，也于此时得到了初步的完成。而且在这几个时期的工作过程中，边区各部队的纪律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模范的纪律的影响之下，其他纪律不好的队伍也逐渐改进了。在实际工作中，使大家认识了“没有优良的纪律，部队就会死亡”的真理。我们和友军之间的关系，这时更趋密切。

而各友军之间彼此的联络与团结，也都有很大的进步，各武装部队都一致了解互相团结是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我们促进各方的关系，克服“只顾自己不顾全局”的错误观念。我们的工作同志更逐渐了解各友军之间的不同特点，在团结各友军中，渐次纠正了理想太高求之太急的态度，严格的和团结友军工作中的左的关门主义的倾向作斗争；努力与友军建立起一种“互相”破除一切怀疑猜忌的心理，避免一切不必要的摩擦，互相学习别人的长处。我们对于各友军的胜利，曾予以普遍的发扬，以互相鼓励，坚决反对自骄自傲的态度。就是遇到友军的困难，我们也总尽力设法互相帮助。我们固然补充自己，但同时也积极设法补充友军，我们曾协助友军进行了扩大部队的工作，而且发动群众帮助友军，慰劳友军。有许多友军官兵掉队，落伍，失联络，受伤，害病的，我们总极力代为收容，招待治疗，并送其归队。一部分的群众，对友军有不满和怀疑的，我们也总代为解释，使友军得以挽回政治影响。虽然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始终保持着和友军彼此间的善意的、诚实坦白的批评精神。这样，大大促进了边区以内各部队的和谐与团结，因而边区的武装力量得到更强大的发展。我们运用了自己所建立的游击队，并使之从斗争中逐渐发展为游击兵团，以至发展为正规兵团，配合着友军，不断去战胜敌人，发动民众，这样就造成主要的条件，具备了建立根据地的最基本的力量的一环。

为了要建立一个巩固的抗日根据地，除了建立武装部队之外，我

们更积极恢复地方的政权。当时各县政权机关，在敌人一度摧残之下，事实已全部瓦解，但是随着地方武装力量的扩大与巩固，这一地区所包括的三省数十余县的地方，势不能任其长久陷于无政府的状态。当时经我们武装力量收复的晋东北十二县，冀西二十县，冀中二十县和察南四县，既与原来各省政府隔绝，无法联络，而其下层之区村各级政权，亦均逃跑或惨被摧残。为巩固抗日根据地计，实有立即恢复地方政权的必要，就是边区各界民众，在县境克服，地方秩序略趋安定之后，亦皆迫切要求政权之再建。虽然当时各地也曾建立有群众半政权的机关，如晋东北各县及冀西某些县分中有动员委员会，冀西沿平汉线之某些县分有自卫会，冀中各县有救国会等组织，这些都是在初期无政府状态时，为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而成立的。他们的任务是：担负战时地方一切动员工作，维持地方秩序。实际上是一种半政权的性质。但是此类性质的机关，纯粹是混乱时期的产物，绝不能认为是长期抗战过程中的唯一合理的组织形式。而且此类组织，名称既不统一，办法亦不尽相同，而且其最高机关只到县一级为止，事实上不能用这种组织去统一全边区的行政，因为他们根本不是正式的政权机关。那时山西第一区政治主任宋劭文先生亦有见于此，即积极建议组织全边区临时政权机关，以统一这区行政，使地方政治有集中之领导，以发挥抗战之力量。我们数度商谈之结果，都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措施，于是我们一面致电请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转呈中央，一面于去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在河北阜平，和冀察两省各军、政、民领